

抗美援朝時期 中國基督教界的控訴運動

• 劉建平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中共於10月19日秘密派出志願軍入朝參戰，從而與美國在朝鮮半島開始了正面的對抗。對剛剛執掌政權的中共來說，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不僅增加了美國武裝干涉中國的危險，也給退居台灣的國民黨提供了重返大陸的某種機遇，而且還會極大地鼓舞國內各種敵對勢力的抵抗熱情。在嚴峻的內外形勢下，中共顯然急需在國內徹底肅清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殘餘勢力」，即「去污」^①，來確保新中國的安全。由此，建國之初難得的寬鬆氣氛轉瞬即逝^②。

在此形勢下，基督教和天主教問題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如果說在抗美援朝戰爭之前，中共對此問題尚有較多的耐心，各項政策還不顯急迫^③，那麼，自從介入朝鮮戰爭後，全面的危機感迫使中共開始着手全面清理中國教會與西方世界的關係。然而，從何處着手進行清理呢？控訴、揭發顯然是首當其衝的。借助控訴動員這一技術和策略，中共可以較為順暢地將基督徒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運行軌道，進而實現新政權建設和社會整合的目標。

目前，筆者尚未見到學界對中國教會的控訴運動有較為深入系統的研究。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討論到該問題的方方面面，僅就中國教會控訴運動的來龍去脈及其影響加以簡單梳理，以供後來的研究者參考。

自從介入朝鮮戰爭後，全面的危機感迫使中共着手全面清理中國教會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借助控訴動員這一技術和策略，中共可以較為順暢地將基督徒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運行軌道，進而實現新政權建設和社會整合的目標。

一 控訴：中國教會的「空前之事」

中國教會內的首次控訴，是在1951年4月16至21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在北京召開的「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以下簡稱北京會議）上。政務院召集此次會議的目的，是期望「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把一百多年來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後地、徹底地、永遠地、全部地加以結束」^④。北京會議雖然以「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的名義召開，

* 本文為201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基督教政策及其歷史經驗研究」（項目號10CDJ005）的階段性成果。

為甚麼控訴在教會群眾裏是一件「新鮮」而又「困難」的事呢？原因在於教徒認為控訴不符合教會的教義。更為重要的是，大凡控訴的對象在許多基督徒的心目中還是虔誠的信徒，因此，「翻起臉來」展開對他們的控訴實在不易。

但在本質上「決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是「一個鬥爭」^⑥，是圍繞如何迅速切斷教會與帝國主義間的關係、如何展開教會與美帝間的鬥爭等議題展開討論。時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秘書長的邵荃麟在致會議開幕詞時就指出：「這次會議的任務是切斷中國教會與美帝國主義的關係，推進三自運動」，認為中國基督教會就好比一座房子，「這房子過去長時期被帝國主義所利用，裏面有很多老鼠、臭蟲，現在首要的工作是打掃房子，把這些老鼠、臭蟲一齊趕出去」^⑦。既然如此，通過控訴認識這些「老鼠、臭蟲」的罪惡就是當務之急。

事實上，北京會議為期六天，而控訴大會就召開了整整兩天。參與控訴的均為中國教會的一些領袖人物，計有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總幹事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總幹事邵鏡三、中華衛理公會華北區會督江長川、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副總幹事江文漢，以及中華聖公會主教院主席主教陳見真等十八人。控訴對象主要是與控訴人相關的外籍傳教士或教會的華籍領袖，如中華基督教全國總鄉村教會事工委員會幹事畢范宇 (Francis W. Price)、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幹事駱愛華 (Edward H. Lockwood)、中華衛理公會理事陳文淵、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梁小初、中華聖公會雲貴教區主教朱友漁、中國著名的自由傳道人顧仁恩。控訴內容主要是清算這些「美帝國主義份子」或「美帝國主義走狗」如何在中國教會內協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⑧。不僅如此，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號召全國同道「堅決揭穿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破壞三自運動的陰謀，積極展開各地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對帝國主義份子和反革命敗類的控訴運動」^⑨。會後，剛剛成立的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籌備委員會專門向全國各地發出了「搞好傳達，搞好控訴」的號召^⑩。

對中國教會來說，北京會議中的控訴無異於一聲晴天霹靂。時任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主席的吳耀宗就指出，在當時「國內鎮壓反革命的怒潮中」，雖然「控訴已經成為大家所熟悉了、習慣了的事」，但是，「在基督教的群眾裏，控訴卻還是一件完全新鮮的事」，而且更「是一件困難的事」^⑪。

為甚麼控訴在建國初期已經為普通老百姓耳熟能詳，在教會群眾裏卻是一件「新鮮」而又「困難」的事呢？原因在於，教徒認為控訴不符合教會的教義。耶穌曾這樣訓導信徒：「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耶穌還告誡：「為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⑫更為重要的是，大凡控訴的對象「在許多基督徒的心目中，還是虔誠的信徒，還是基督教忠實的領袖」，而且「許多人同他們不只是同道同工，也是親密的朋友」。因此，「翻起臉來」展開對他們的控訴「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⑬。

既然這樣，難道那些教會領袖就不清楚耶穌的訓育嗎？就能夠輕易對朋友「翻起臉來」嗎？當然不是。據曾經參加北京會議的《天風》周刊主編沈德溶回憶，當時「各教派的頭頭對於『控訴』這件事顧慮重重，不敢表態」，有的「平時口若懸河，此時卻噤若寒蟬」，有的「則雖發言卻是『王顧左右而言他』」^⑭。另據最先控訴的崔憲詳自述，過去他「總是抱着『與世無爭』，以及『隱惡揚善』的風度待人接物」，「不說別人壞話」，所以，在進行控訴的前一天晚上，這個「無論在任何生

疏地方總可以安危入睡」的人，在「同室的人都睡熟了」，自己卻「一夜不曾瞌眼」，而且「在這一夜當中，感觸多極了」，當然也就「深深的體會到思想鬥爭的苦痛」。但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⑭，崔憲詳最終還是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信條和對教義的理解，參與了控訴，而且認為「在這次控訴當中，教育了我，也大大的幫助了我」，事後還體會到了一種難得的「快樂」^⑮。

中國教會領袖的控訴，「儘管控訴的是一些雞毛蒜皮之類的事，但堅冰終被打破」，這「第一槍」不僅打破了教會內部從無控訴的先例，也給廣大信徒以極大的影響。也就是說，「有人帶了頭，其他的人就容易跟上來了」^⑯。難怪之後吳耀宗稱「這次會議中的控訴」是「中國基督教歷史中一件空前的事」^⑰。

二 控訴：「肅清基督教內部帝國主義影響的最有效的方法」

儘管許多教會領袖在北京會議上帶頭進行控訴，但要使一般教徒很快就轉變觀念仍有不小的難度。著名傳道人王明道就堅持認為，「聖經上從來就沒有過控訴的事」^⑱。許多普通信徒也因種種理由難以控訴起來。如陝西省靖邊縣在控訴外籍傳教士沙智林 (Antoon Renson) 和文懷德 (Remi Van Hyfte) 前，發動教徒進行訴苦時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當基層幹部訪貧問苦時，教徒或以懷念外籍傳教士的恩惠作答，說「沙神父好，我們小時不好好唸書，人家外國拿來的洋糖給我們吃，哄得叫唸書」；或以「甚麼也不知道」來應付，「嘴合的〔得〕緊緊的不說話，問的〔得〕沒辦法了便說：『咱也沒得過利，也沒受過害，別人的事咱不知道』」；甚至還替外籍神父辯護^⑲。

為使教徒拋開顧慮，積極投入控訴之中，北京會議剛一結束，中共中央很快就對這一鬥爭工具明確表態。1951年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指出基督教徒的控訴運動「是在廣大教徒中普及與深入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的最重要的方法」，更是掃除「同帝國主義份子進行鬥爭的障礙」的「最有效的辦法」。因此，「全國各地的基督教徒，都應該積極參加對美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⑳。

之後，《人民日報》又刊發了專門指導教徒如何開展控訴的文章——劉良模的〈怎樣開好教會控訴會〉。劉文指出：「全國各地基督教教會和團體的當前中心工作之一便是要開好控訴會。」為甚麼要控訴呢？「因為百餘年來，帝國主義利用了基督教侵略中國，所以我們要控訴它的罪行。」至於怎樣開好控訴會，劉文給出了非常詳盡的指導。首先，「必須去掉許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顧慮」。對那些主張「隱惡揚善」的教徒，應從教義上向他們說明「耶穌對當時文士、法利賽人的責罵，便是控訴」；對那些覺得「控訴不起來」的教徒，應該讓他們「多去參加各界人民的控訴大會與公審反革命份子大會」，以「激起基督徒對帝國主義與教會敗類正義的憤怒與控訴」。其次，必須事先「做好準備工作」。每個教會和全市性的教會聯合會應該先組織一個控訴委員會，「研究要控訴誰，請誰來控訴」，然後再「請那些參加控訴的人出席一個控訴動員會，使他們在思想上建立為甚麼要控訴與控訴甚麼的觀念」。此外，還須「先在各教堂、各團體舉行控訴小組會」，即控訴前的「彩排」，以便「發現控訴最有力的幾個人，請他們參加控訴大會」。再次，控訴應該「破除情面」，「要句句話是從心裏面講出來」、「要徹底，要痛痛快快、

為使教徒拋開顧慮，積極投入控訴之中，中共中央很快就對這一鬥爭工具明確表態。1951年《人民日報》社論旗幟鮮明地指出基督教徒的控訴運動「是在廣大教徒中普及與深入開展三自革新運動的最重要的方法」，更是掃除「同帝國主義份子進行鬥爭的障礙」的「最有效的辦法」。

誠懇懇地和盤托出」，最重要的是「要站穩自己人民的立場」。最後，召開控訴大會時，「會場空氣要嚴肅」，控訴者的順序「應該按照先緊張、後緩和、再緊張的程序來排列」^②。《人民日報》這樣詳盡的指導無疑大大地推動了控訴的開展。

對於控訴這樣的鬥爭方式，毛澤東也非常重視。1951年8月，中共南京市委在向中央匯報宗教革新工作時稱：「我們在各個基督教會中先後開展了控訴運動」，「啟發教徒揭發與控訴教會的黑暗、專橫、反動的事實」，以此來「樹立教徒的主人翁思想，從而展開教徒與神職班的正面鬥爭，以確立教會中的進步群眾優勢」。毛澤東閱後，完全肯定了南京市委在教會內部開展控訴的鬥爭方式，並立即批示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胡喬木，「此件很好，請印發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及其管理宗教事務的機關」。胡喬木受命後即向全國各地轉發，並加了這樣的批語：「南京市委這個報告很好，其中關於進行基督教工作的方式和步驟的經驗，很值得各地學習，特印發給你們研究」^②。

除此以外，吳耀宗等人也盡力從教義上為控訴找尋依據。吳耀宗認為，控訴並不違背耶穌的訓育，而「是完全符合耶穌的教訓的」。因為「耶穌叫我們不要論斷人，是叫我們不要從自私和驕傲的觀點出發，吹毛求疵地在別人身上找過錯，而忘記了我們自己所有的，也許是更大更多的弱點」。吳耀宗甚至還認為耶穌自己就曾身體力行地進行過嚴厲的控訴。他說：「馬太福音第23章^③就是耶穌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訴」，耶穌「不但以正義的呼聲來反對罪惡」，而且還「以勇敢的行動來打擊罪惡。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儀式來進行剝削的人們趕出聖殿」^④。既然控訴是「肅清基督教內部帝國主義影響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⑤，而且並不違背耶穌的教訓，教徒就理應責無旁貸地參與其中了。

吳耀宗等人盡力從教義上為控訴找尋依據。他認為控訴並不違背耶穌的訓育，「馬太福音第23章就是耶穌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訴」。既然如此，教徒就理應責無旁貸地參與其中了。

三 毛團庫倫：一個典型的控訴發動個案

陝西省靖邊縣五區的毛團庫倫和小橋畔等地的控訴較為典型，頗能說明控訴的發動情況。靖邊縣五區的毛團庫倫和小橋畔有兩個天主教堂口，共有教徒321戶，男381名，女455名。依據對待三自革新的態度，這些教徒大致被劃分成三類，即「遵守教規，積極唸經，並袒護天主教」的91戶、「既不積極，也不反對，持平常態度」的149戶，以及「經我們〔靖邊縣委統戰部〕近年來宣傳教育與一些具體事實的感動，對天主教消極支援」的81戶。

1951年9、10月間，為驅逐負責當地教會工作的外籍傳教士沙智林和文懷德，靖邊縣政府特派兩名專職幹部甄平、詹玉珠下至基層，配合統戰幹部「發動教徒訴苦，收集更多的材料以供審案」。9月27日晚，兩名專職幹部抵達毛團庫倫。在摸底工作中，甄、詹二人發現教徒無不充滿了對政府宗教政策的擔心和對外籍傳教士的好感。如一位年長的教徒說：「有人說先整一貫道，後整天主教」；另有些教徒詢問：「聽人說要把沙神父關押，到毛團庫倫是不是要收拾^⑥李神父^⑥去？」

見此情形，兩名專職幹部「首先從黨內着手」，於「三十號晚上召開了全鄉十七名黨員大會」，緊接着在第二天，即「十月一日召開了革新代表會議」。在這兩次內部會議上，「講清逮捕沙、文神父的理由及根據，首先打通了黨員與幹部

的思想」。在這樣的動員、傳達會議之後，被動員起來的基層幹部便行動起來，進行宣傳。「毛團庫倫、小橋畔、硬地梁子三堂口均有工作幹部參加幫助，召開了村民會議」，「二政村則由村主任及代表負責領導，亦召開了村民會議，進行了廣泛的宣傳發動」。然而，在與教徒的初次正面交鋒後，幹部發現效果並不理想，「在發動中看見像有問題，可是〔教徒〕不說」。經過分析後，甄、詹二人認為，大多數教徒「對問題反不轉、想不通」，還有一些教徒「得過〔外籍傳教士的〕利益」，另有一些教徒「思想古舊」，「尚存有變天思想，怕洋人再來」。

基於上述情況，專職幹部甄、詹二人再次召集會議，「利用會議講清帝國主義如何侵略我國，霸佔我國土地，在後台指揮下當老闆，使得中國人殺中國人等道理」。與此同時，甄、詹二人「又給各代表教給發動的辦法」，如要「以算細賬，提頭頭的方式三番五次的發動」等。如此，「小橋畔開村民會三次」，「硬地梁子兩次」，終於達到了「提高人民覺悟」的目的，因為開始有教徒「向帝國主義份子展開了鬥爭，寫出控訴狀子」。

一旦有人開始帶頭控訴，問題似乎就變得簡單起來。小橋畔「在第一〔個〕晚上開會只有三人寫呈狀，其餘人不說話」，但經過「第二天中午及晚間的發動」後，開始有「三十五個參加，寫出呈狀十份，供出沙智林罪惡十五件」。毛團庫倫、硬地梁子的情況也大體相似。當群眾被發動起來以後，召開更多人參與的控訴大會的時機顯然已經成熟。於是，「四號上午召開了三鄉的毛團庫倫、小橋畔、四鄉的硬地梁子共二百四十人的控訴大會」，「宣讀了沙、文帝國主義份子的罪狀」，而且國籍神父張耀世、李景星還「起草寫出驅逐沙、文神父出國的宣言」，「神父張耀世、李景星、修母趙瑪利、高理綱、張進儒、析瑪利、李瑪大都簽了字，到會的二百四十人，一致舉手簽名擁護這一宣言」。

隨後，參與控訴的人愈來愈多，由開始的幾個人發展到後來的150人，列舉的「罪狀」也不斷增加，最終達24件之多，計有「打死群眾」、「拆散婚姻」、「指揮團隊打我紅四軍」、「行兇霸道趕走群眾的耕牛」、「造子彈」等。經過這樣的控訴之後，「一般教民是發動起來了，尤其是代表熱情很高，神父修母雖有懼怕心理，但基本上靠近了我們〔靖邊縣委統戰部〕，有事和我們商量」。靖邊縣委在總結中還認為，以後應「更多的培養積極份子，尤其是注意培養幹部」，而且要「隨時隨地給以撐腰出主意」，這樣才能更好地開展控訴^②。

四 控訴在全國形成運動之勢

經各方的積極推動以及吳耀宗等人的再三努力，中國基督教和天主教內的控訴很快就在全國展開，形成運動之勢。

北京會議結束剛剛兩個月，上海、濟南、南京、宿遷等36處就已舉行了大大小小的控訴會。據蘇北宿遷的報告，該縣5月27日的控訴大會共有「城鄉教會代表四百四十六人，包括二十二個單位」，各教會的長老牧師控訴了「美帝份子」梅克堪和鮑達理^③。即便是那些「由外國傳教士長期嚴密控制」的教會，也很快就投入控訴之中^④。另據不完全統計，僅1951年，中國基督教各團體先後在全國137個城市進行了規模較大的控訴會達228次之多^⑤。至於小規模的控訴會就更

1951年9、10月間，為驅逐外籍傳教士沙智林和文懷德，靖邊縣政府特派出兩名專職幹部下至基層，配合統戰幹部發動教徒訴苦。在與教徒的初次正面交鋒後，幹部發現效果並不理想，於是多次召集會議，之後開始有教徒寫出控訴狀子。一旦有人帶頭控訴，問題似乎就變得簡單起來。

多了。如1951年5、6月間，一個小小的蘇州城，僅基督教教會團體就先後舉行了大小控訴會26次，參加教徒超過2,000餘人，親自登台控訴的160餘人^②。又如山東馬莊的基督教團體耶穌家庭在革新階段也是控訴不斷，「全家兩百多成年信徒中，有122人報名控訴」^③。

上海作為中國基督教的中心和三自革新運動籌委會的所在地，更是走在了控訴運動的前列。1951年6月至10月，上海基督教各團體就多次舉行了控訴會（表1），參與控訴者均為中國基督教內的頭面人物，而且控訴會規模都不小，有時與會者竟超過萬餘人。

表1 1951年6月至10月上海基督教教會團體部分控訴會統計

日期、地點	單位	主要控訴人	控訴題目或內容	被控訴者
6月1日 慕爾堂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崔憲詳，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副會長	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協進會侵略中國的陰謀	羅炳生、陳文淵、司徒雷登
		繆秋笙，前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主席	美帝怎樣通過基督教協進會破壞三自革新運動	密爾士、穆德、海維德
		吳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美帝怎樣控制全國基督教協進會進行侵略活動	
		林永侯，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幹事	美帝利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作為情報間諜機構	海維德、霍金、畢范宇、鮑引登
6月3日 懷恩堂	靈糧堂	周福慶，靈糧堂長老、靈糧堂世界布道會副會長	控訴美國侵略工具趙世光	趙世光
		李劉淑蘭，靈糧堂執事	控訴趙世光逃港借修造禮拜堂騙取信徒財物	趙世光
		陸傳芳，靈糧堂執事	控訴美國特務顧仁恩	顧仁恩
6月10日 逸園	上海各基督教團體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委會主席	對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罪行的控訴	裨治文、伯駕、穆德、司徒雷登
		江長川，衛理公會華北區會督	控訴美帝國主義勾結蔣匪利用衛理公會侵略中國的罪行	安迪生、黃安素、陳文淵
		鄧裕志，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	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青年會、女青年會侵略中國	
		胡祖蔭，廣學會總幹事	控訴帝國主義利用廣學會侵略中國	李提摩太、海立德、薩玉珍
		竺規身，靈工團監督	控訴美帝國主義對我的毒害	
		崔憲詳，中華基督教總會總幹事	控訴美帝國主義份子畢范宇在中華基督教會內的各種陰謀活動	畢范宇
		吳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	控訴美帝國主義特務畢范宇	畢范宇
7月27日 慕爾堂	中國基督教男女青年會	鄧裕志，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	控訴美帝如何通過美國女青年協會國外部等對中國的侵略罪行	
		涂羽卿，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	控訴美帝國主義在解放前後利用青年會侵略中國的陰謀和罪行	
		吳耀宗，青年會全國協會出版組主任	控訴美帝國主義在青年會內利用改良主義侵略中國	穆德、艾迪、晏陽和霍德金

日期、地點	單位	主要控訴人	控訴題目或內容	被控訴者
7月29日 救主堂	中華聖公會上海各堂	沈子高，中華聖公會中央神學院院長	控訴美帝國主義百年來利用聖公會之罪狀	文惠廉、施約瑟、羅培德
		毛克忠，中華聖公會江蘇教區主教	控訴美帝國主義份子前任聖公會江蘇教區主教羅培德	羅培德
		林步基，中華聖公會常務委員會駐滬辦事處主任	控訴美帝走狗教會敗類朱友漁	朱友漁
8月26日 武進路 滬北教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所屬—— 中華三育 研究社與 江浙三育 社	彭湘生，中華三育研究社學生會主席	控訴美帝利用安息日會侵略中國的罪行	甘盛典、舒雅各、蔣森、柏仁生等
		田雅各，江浙三育研究社教員	控訴美帝走狗何秉端反人民言論罪行	何秉端
		曾悅蘭、彭華冠、姚文田、胡秉德， 中華三育研究社學生	控訴美帝走狗沈緒成罪行，控訴美帝走狗林堯喜罪行	沈緒成、林堯喜
8月4日 新天安堂	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廣學會、中華聖經公會	張伯懷，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總幹事	控訴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出版事業為侵略工具的罪行	
		繆秋笙，中華聖經會理事	控訴美帝利用中華聖經會侵略中國的罪行	
		劉美麗，廣學會《女鐸月刊》主編	控訴美帝國主義對我的毒害並自我檢討	
		謝頌羔，廣學會《讀經會報》主編	我對於自己的錯誤思想的檢討	
9月5日 景林堂	安息日會 時兆報館	南祥謙，時兆報館工會主席	控訴美帝利用時兆報館進行文化侵略的罪行	米勒耳、羅威、史約翰、席爾、徐華、李素良
		顧長聲，時兆報館編輯	控訴美帝份子柏仁生、走狗徐華	柏仁生、徐華
10月14日 基督徒 聚會處	安息日會 中華總會	南祥謙，安息日會控訴指導委員會秘書處主任	控訴美帝利用安息日會醫院學校報館廣播等進行侵略中國的罪行	徐華、林堯喜等
		徐世勳，杭州安息日會負責人	控訴安息日會中華總會會長徐華	徐華
		程步雲、洪聲璜，安息日會中華總會 職工	控訴徐華	徐華
		彭湘生，安息日會控訴指導委員會常委	控訴美帝走狗林堯喜罪行	林堯喜

資料來源：湖北省檔案館，全宗ZND，目錄197，第53-56張。

通過對大量有關中國基督教的控訴材料的分析，不難看出，供職於中國基督教團體內的西方神職人員無疑是重點的控訴對象，尤其是美國籍的傳教士，更是成為控訴的重中之重。除西方神職人員外，新中國成立前逃亡海外的中國籍教會領袖、教會內與外國神職人員關係密切者或者對三自革新運動稍有異議者，也都被列入控訴之列。從參與控訴的人員來看，中國基督教內的控訴者基本上都是全國教會或地方教會重要的教牧人員。他們往往寄希望於通過控訴的方式來劃清與「帝國主義」的界限，並以此獲取在新中國的生存權。至於控訴的罪名，則主要集中於以下幾種：(1) 利用宗教進行文化侵略；(2) 進行間諜、特務活動；(3) 反蘇反共；(4) 殘害中國人民，壓迫中國同道；(5) 新中國成立前「勾結蔣匪、日帝」；(6) 破壞新中國的各種群眾運動；(7) 散播各種謠言，蠱惑人心；(8) 破壞三自革新運動；(9) 帝國主義走狗、教會敗類；(10) 在各自供職單位內的陰謀活動，等等^④。

從控訴的組織情況來看，中國基督教內的控訴都是各教會團體自行組織起來的，但中國天主教內控訴會的政府主導色彩非常明顯。這些差別反映出新政權的權力觸角在伸向兩大宗教時的難易程度。

控訴運動在中國基督教內掀起後，中國天主教顯然就很難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各地為推動天主教的革新工作，無一例外地把控訴作為重要工作，所以無論是控訴規模，還是控訴數量，天主教都絲毫不弱於基督教。河北省天主教天津教區著名的西開天主堂，從1951年7月中旬至9月中旬短短兩個月內，就先後舉行了五場控訴會，其中9月16日的控訴會到會者超過6,000餘人^⑤。

但細細查看，兩大宗教內的控訴還是有不小的區別。不同於基督教的是，中國天主教內的控訴基本上看不到教會領袖、各地神長參與其事，被動員起來的一般教徒或教外群眾充當了控訴的主力軍。從控訴的組織情況來看，中國基督教內的控訴從表面上看來都是各教會團體自行組織起來的，但中國天主教內控訴會的政府主導色彩非常明顯。此外，從控訴的內容來看，中國基督教內的控訴內容總體上比較「虛」，大都停留在「文化侵略」、「陰謀活動」、「特務」、「走狗」之類。但中國天主教內的控訴相對較「實」，如絕大多數的控訴集中於天主教收養孤兒的行為，指其以慈善為名「殘殺中國兒童」等^⑥。這些差別突顯了兩教在教義和組織上的不同，也反映出新政權的權力觸角在伸向兩大宗教時的難易程度。

五 「重生」：控訴運動對中國教會的影響

作為教會內的「空前之事」，控訴不管是對中共，還是對中國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都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首先，通過控訴動員這一技術和策略，中共成功地使部分中國教會領袖在表上接納了新中國，認同了新政權。中共政權建立後，為數不少的教會領袖和信徒都秉持一種「超政治」的態度，他們在內心懷疑中共的宗教政策，擔憂教會事業在新中國的前途。這種狀況顯然與中共的建政目標相去甚遠。然而，控訴過後，他們的懷疑不但一掃而光，大呼「政治覺悟提高」，喜獲「重生」，更明確表示要熱愛新中國，「遵行政府一切法令」。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執行幹事繆秋笙參加完北京會議後感慨不已，不但稱自己「政治認識」提高，「更感覺到政府領導的賢明而正確」，因而「要與人民政府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團結起來」^⑦。劉良模認為，通過控訴使「中國基督教獲得了重生」，當他聽到毛澤東對大會代表的祝願後，竟「被感動得流下淚來」^⑧。中華基督教會湖北大會理事長萬福林則表示要「徹底悔改，努力工作，參加一切愛國運動，遵行政府一切法令，擁護國家一切利益，力行三反，實現三自」^⑨。中國教會對新政權的認同，以及對中共的絕對擁護，毫無疑問正是中共所需要的。

其次，經過持續不斷的控訴，中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形象發生了變化。當1950年吳耀宗等人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三自宣言」時，還為宣言中如何表達中國教會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問題而感到為難^⑩。但經過激烈的控訴之後，問題基本上得以解決。中國基督教界已很少有人敢懷疑「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充當侵略中國的工具」、外籍傳教士就是帝國主義份子等結論。教會內的各種慈善、救濟事業也不再是救死扶傷的愛心之地，而成為借慈善之名行「殘害中國人民」之實的「殺人魔窟」。即便是幾十年之後的今天，很多信徒對此仍耿耿於懷，盡力為教會的清白辯解^⑪。

再次，控訴改變了外國神職人員在許多中國信徒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如陝西省三原縣的三名女教徒，在控訴會之前參加西安的學習班時「還說外國〔傳〕教士怎樣好」，但「控訴會後，恍然大悟」，「回去以後自動把帝國主義份子為籠絡她們的小恩小惠毛巾、襪子還給外國人」，甚至「對這些帝國主義份子下了逐客令」，其他那些「以前以為和帝國主義接近是光榮的」人，「現在感覺到是莫大的恥辱了」^④。又如天主教三原教區主教班錫宜 (Feroimana Pasini) 和意大利籍傳教士謝霖嘉，控訴之前在教徒心目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教徒認為「班主教不出門光唸經，是好人」，甚至連當地革新委員會的主任亦承認其是「好人」。但經過當地黨委組織的大小四次控訴會後，大多數教徒被「激起了對帝國主義的仇恨思想」，班、謝二人的道德形象亦隨之一掃而光。有教徒就說：「我過去在益華小學上學時，帝國主義份子班錫宜，把糖拋在地上，小娃娃拾糖吃，他就大笑起來，把我們中國兒童當雞一樣看待」；年長的呂老太太也說出了「我信的是天主，不是外國人〔班錫宜〕，政府驅逐他們就像把麥地裏野草鋤了一樣，不鋤掉，麥子就長不好」的話；甚至以前被中共三原縣委認為「沒明沒黑的鑽在堂裏唸經」的「最落後的八十一歲的王生財之母親」也表示：「班、謝是瞎人^④，政府做的〔得〕對」^④。在教徒感到與外籍神職人員打交道是一種「莫大恥辱」的情況下，驅逐這些傳教士顯然不會再有太多的阻力，因而也不會引起較大的混亂。

最後，控訴是爭取教徒參與革新的「一個成功辦法」。中國基督教和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發起後，很多教徒基於信仰方面的原因拒絕簽名，反對革新。但經過控訴後，相當一部分教徒頓時改變了態度。中共北京市第十三區委員會就認為：「參加控訴會是提高教育教徒的一個成功辦法。」該區正福寺天主堂對仁慈堂展開激烈的控訴後，「把群眾的覺悟程度普遍提高了一步」，「落後份子」尹文鎖會前看到神父還感到「心裏有點發麻」，但大家控訴後「覺着該叫他〔神父〕站到前頭〔對其進行批鬥〕」；教徒張斌也說：「要不是毛主席領導我們革新，我們總在火炕裏，我以前不敢見你們，這一回可不得了！」「頑固份子」王德義則說：「我沒好好革新，我真怕大家把我叫到前頭〔進行批鬥〕」；更有教徒以實際行動表示對革新的擁護，教徒「趙蘭茹、張志誠的妻子都說自己有法蒂瑪聖母等反動小冊子，教徒楊春榮自動交出聖母慈愛祈禱會的小冊子『聖瑪利亞』」，「總之從參加三次控訴會來看，一次比一次都對教徒起了更深刻的教育作用」^④。吳耀宗也承認：「中國基督徒的控訴運動，在肅清基督教內帝國主義影響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大家認識了帝國主義份子「假冒為善的面貌」^④。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宗教畢竟有其特殊性，信徒並不會都因為政治的干涉或政府的強力，就完全改變其對宗教教義、教規的信守態度，尤其是那些虔誠、年長的教徒。在空前緊張的鬥爭氛圍中，許多信徒非但沒有參與控訴，而且對許多控訴者對教會的指控表示質疑。在全國各地展開對顧仁恩的控訴後，一位名叫汪竹影的教徒就致函指控顧仁恩殘害其女的楊紹彭，認為「六年前你女兒秀英的事，你到現在才表示出來，可想你是受了某種人的主使」，並「斷定你的女兒是愛他萬分，失戀後就反咬一口說是被顧君姦污了，想藉口可以嫁給他」；至於顧仁恩在青島的自供，汪竹影稱：「老實說，顧先生在青島的一篇自供，看見的人亦無不說是強迫他說的」^④。即便是許多信徒迫於壓力參與了控訴，但其實控訴並非他們所願，所以在控訴過程中，才會不斷出現「控訴的人抱着溫情

通過控訴動員這一技術和策略，中共成功地使中國教會接納了新中國，認同了新政權。中共政權建立後，為數不少的教會領袖和信徒都在內心懷疑中共的宗教政策，擔憂教會事業在新中國的前途。然而控訴過後，他們的懷疑表面上一掃而光。

主義和敷衍的態度，談遠不談近，談外國人不談中國人」的情況，或者乾脆只控訴些「雞毛蒜皮」之事，「對帝國主義的重大罪行反忽略了」^{④⑤}，或者「白天控訴帝國主義份子，晚上卻偷偷去懺悔」^{④⑥}。

也正因為如此，一旦政治控制出現鬆動或政府的強力因素退卻，當年在激烈的控訴中加於中國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諸多「罪狀」便會慢慢地褪去。正如當年參加控訴的沈德溶在半個世紀之後才心平氣和地回憶道，「對傳教士應該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是為傳揚福音來到中國，他（她）們安貧樂道，幾十年生活在條件艱苦的農村中，過着和中國老百姓一樣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死在中國」，這些傳教士「是我們的朋友」^{④⑦}。

註釋

① 劉良模曾如此比喻：「我們中國基督教會就好像受到被帝國主義玷污的一個人，怎麼去掉他的被玷污之處呢？那就要用一塊肥皂把她洗一洗就好了。我們的控訴運動就好比是一塊肥皂，一洗，教會就乾淨了。」參見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0），頁55。

② 參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編，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90-91。

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222-27、408-12。

④⑦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新生——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的感想〉，載羅冠宗主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1950-1992）》（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1993），頁25；27。

⑤ 陸定一：〈在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上的講話〉，《天風》，總262-263號，1951年5月8日，頁202。

⑥ 引自沈德溶：〈北行日記〉（中），《天風》，總264號，1951年5月19日，頁240。

⑦ 具體的控訴發言，可參見《人民日報》，1951年4月25日。

⑧ 上海市檔案館，全宗B22，目錄2，卷號2，第1張。

⑨ 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搞好傳達，搞好控訴！〉，《天風》，總262-263號，1951年5月8日，頁225；陝西省檔案館，全宗123，目錄8，卷號392，第7張。

⑩⑫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新生——出席「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的感想〉，《天風》，總266號，1951年6月2日，頁262；262-63。

⑪ 《聖經》（上海：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2005），馬太福音第7章。

⑬⑭⑮ 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頁81；81-82；190。

⑭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沈德溶回憶，當時小組會已開到第三天，但「局面仍沒有打開」，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宗教事務處處長周力行「不得不聲色俱厲地推動大家起來控訴，這使某些人確實感到了壓力，不得不認真考慮自己何去何從」。參見沈德溶：《在三自工作五十年》，頁81。

⑮ 崔憲詳：〈我對於控訴的一點經驗和體會〉，《天風》，總264號，1951年5月19日，頁232。

⑯ 王長新：《又四十年——王明道先生的口訴歷史》（多倫多：加拿大福音出版社，1997），頁19。

⑰ 陝西省檔案館，全宗123，目錄8，卷號316，第44張。

⑱ 〈開展基督教徒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控訴運動〉，《人民日報》社論，1951年4月24日。

⑲⑳ 劉良模：〈怎樣開好教會控訴會〉，《人民日報》，1951年5月21日。

- ⑳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442-43。
- ㉑ 耶穌向眾人和門徒講論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罪惡，參見《聖經》，馬太福音第23章。
- ㉒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的新生〉，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1950-1992）》，頁27。在這段時間，《天風》雜誌先後發表了多篇為控訴尋找理論依據的文章。如應元道：〈控訴的宗教意義〉，《天風》，總265號，1951年5月26日，頁248；陳崇桂：〈我控訴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國〉，《天風》，總264號，1951年5月19日，頁229-31；陳崇桂：〈為甚麼要控訴？〉，《天風》，總267號，1951年6月9日，頁277-79。
- ㉓ 「收拾」為陝西方言，打擊之意。
- ㉔ 李神父指當時駐小橋畔天主教堂內的國籍神父。
- ㉕ 以上內容引自陝西省檔案館，全宗123，目錄8，卷號316，第43-47張。
- ㉖ 吳耀宗：〈全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近況〉，《天風》，總270號，1951年6月30日，頁314。
- ㉗ 沈德溶：〈記上海基督教界的控訴運動〉，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總第105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248。
- ㉘ 陝西省檔案館，全宗228，目錄2，卷號15，第1張。
- ㉙ 湖北省檔案館，全宗ZND，目錄197，第40張。
- ㉚ 陶飛亞：《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耶穌家庭（1921-195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頁254。
- ㉛ 參見湖北省檔案館，全宗ZND，目錄197，第37-52張；〈全國各地基督教控訴材料索引〉，湖北省檔案館，全宗ZND，目錄202，第175-83張。
- ㉜ 河北省檔案館，全宗938，目錄3，卷號11，第16-18張。
- ㉝ 北京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12，卷號89，第99-106張、第38-41張。
- ㉞ 繆秋笙：〈我從北京帶回來的幾個感想〉，《天風》，總265號，1951年5月26日，頁251。
- ㉟ 劉良模：〈劃時代的大會〉，《天風》，總265號，1951年5月26日，頁252。
- ㊱ 萬福林：〈會後感想〉，《天風》，總265號，1951年5月26日，頁252。
- ㊲ 為聯繫到更多的教會領袖署名於即將發表的「三自宣言」，吳耀宗在內容上作了很大讓步，例如把原來的一條「基督教團體應以不用外籍人員為原則，其實行辦法應與政府協商規定之」改為「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凡仍仰賴外國人才與經濟之協助者，應立即擬定具體計劃，在最短期內，實現自力更生的目標」，之後又將「立即」二字刪去，以避免「許多人以為是要立即斷絕外國的經濟關係」的誤會。又如把引言中「又因為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國家，主要的都是這些帝國主義的國家」一句改為「又因為把基督教傳到中國來的人們，主要的都是從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來的」。吳耀宗：〈基督教革新運動的新階段〉，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1950-1952）》，頁17-18。
- ㊳ 根據筆者對宗志杰的訪談資料整理而得，2007年3月2日下午於陝西省興平市莊頭鎮南于村宗志杰家。
- ㊴㊵ 陝西省檔案館，全宗123，目錄8，卷號392，第8張。
- ㊶ 「瞎人」，陝西關中地區方言，壞人之意。
- ㊷ 陝西省檔案館，全宗228，目錄1，卷號6，第114-19張。
- ㊸ 北京市檔案館，全宗1，目錄6，卷號564，第65張。
- ㊹ 吳耀宗：〈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四年來的工作報告〉，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文選（1950-1992）》，頁45。
- ㊺ 〈反革命份子膽大包天，竟以匿名信威脅楊紹彭〉，《天風》，總264號，1951年5月19日，頁230-31。
- ㊻ 江蘇省檔案館，全宗3089，目錄4（永久），第47張。